

社会对抗:马克思交往异化思想的实质

刘文艺

(暨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32)

摘要:交往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在现代私有制条件下,它以普遍“异化”的形式出现。“交往异化”表明了人们之间不是按照人的方式,而是按照物的方式相互对待。在交往异化的境遇下,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变成了“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或“物化关系”。在交往异化的“物化”表征之下,隐藏着“人与人之间的真实关系”,即社会对抗。社会对抗集中体现在两个维度:一个是横向的人与人之间的普遍对抗,另一个是纵向的资产者与无产者之间的阶级对抗。

关键词:交往异化;物化;社会对抗

中图分类号:B 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0X(2016)05-0053-05

马克思的交往异化理论是在其阐述异化劳动基本规定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它不仅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总体像”,而且为我们诊断现代社会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因而,挖掘马克思的交往异化思想的“实质”,对于反思现代性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交往与交往异化

马克思十分看重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指出“同他人直接交往的活动等等,成了我的生命表现的器官和对人的生命的一种占有方式”^{[1](P86)},“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2](P24)},就连人的语言,也是“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3](P34)}。一定程度上说,交往就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与很多人从抽象的人性或孤独的个人来考察人的存在方式不同,马克思用“社会关系”来限定“交往”范畴。如马克思说:“commerce, Verkehr(商业、交往)……。所有这些字眼既意味着商业关系,也意味着作

为个人自身的特征和相互关系。”^{[4](P255)}又说:“我在这里使用‘commerce’一词是就它的最广泛的意义而言,就象在德文中使用‘Verkehr’一词那样。例如:各种特权、行会和公会的制度、中世纪的全部规则,曾是唯一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和产生这些制度的先前存在的社会状况的社会关系。”^[5]显然,在马克思看来,交往就是特定历史条件下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社会关系。马克思的这种限定,从基底上彰显了“交往”的两个基本特征:其一,客观必然性,“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6](P12)};其二,历史生成性,交往是一定历史情景中的交往,人应该做些什么,应该马上做些什么,这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既定的历史环境,同时,交往也会随着人类生存的历史性展开而变换着自己的形式。

基于交往的这些特征,我们一方面可把“交往=社会关系”理解为人的本质,因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7](P56)}。另一方面,又可把历史上的交

收稿日期:2016-01-28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生存论视域下的马克思社会理想研究”(14YJC710026);广东省委宣传部委托项目“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WT1432)

作者简介:刘文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暨南大学讲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及科学社会主义研究。

往形式勘定为“真正的交往”与“异化的交往”。所谓“真正的交往”,即“按人的方式”所进行的人与人之间“以互补为目的”的交往。为了突出真正交往的“互为目的性”,马克思曾说“交往、联合以及仍然以交往为目的的叙谈,对他们说来已经足够了”^[6]。具体地说,“真正的交往”体现为一种“直接性社会关系”;从总体而言,他们是一切关系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机体;从双方而言,彼此之间是基于人格上的“互补互证”,即“在你享受或使用我的产品时……,对你而言,我是你与类之间的中介,你自己认识到和感觉到我是你自己本质的补充,是你自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而我认识到我自己被你的思想和你的爱所证实”^[7](P184);从个体而言,“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8](P515)。

相反,当人们“不按人的方式来组织世界”,彼此“互为手段”时,他们的交往也会随之发生异变,导致交往异化。至于什么是“交往异化”,马克思没给出明确的定义,不过,我们可以从他关于异化劳动的论述中窥见一斑。

异化劳动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核心概念。在阐释异化劳动的规定时,马克思首次论及“交往异化”,说:“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后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9](P59)在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系统中,Entfremdung(“异化”或“疏远”)和Entausserung(“外化”或“异化”)这两个术语意味着事物的分离及事物之间的冷淡、敌对关系的确立。如马克思谈到劳动异化时说,它是指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不难理解,马克思在这里是从“主客逻辑”来界说劳动异化的,认为劳动主体的产物,在一定条件下聚合成了一种与主体相分离的客体,一种统治主体、控制主体、与主体愿望背道而驰并抹煞主体打算的异己力量。如果说劳动异化发生在“主体-客体”之间,而“交往异化”则发生于“主体-主体”之间,属于“主体际逻辑”。从而说明异化不仅存在于“主客体间”,也存在于“主体际”,即“凡是适用于人对自己的劳动、对自己的产品和对自身的关系的东西,也都适用于人对他人、对他人的劳动和劳动对象的关系”^[10](P59),只不过,交往异化突出强调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畸变,处于与“真正交往”——彼此之间互生、互补和互证的直接性社会性——相颠倒的存在样态。

当然,交往异化的普遍发生,是以现代私有制条

件下人的独立性、私人所有及利己主义为境遇的,正是这特定的境遇,不仅道出了交往异化的“历史性”特征,还说明它不是一个“虚幻”的东西,总会以一定的“形式”展示出来。

二、交往异化的形式:物化

戈德利尔说:“马克思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通过对商品、货币、资本等的分析,‘真实地再现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以颠倒的形式表现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或观念上的各种事实,阐明了社会关系所带有的那种虚幻性”^[11]。这个判断揭示了马克思交往异化思想中的一个要点:以“物”(商品、货币、资本等)的形式表征现代社会中的“交往异化”事实。

“物化”,就是人们彼此关系的非人化、事物化。这一概念的提出,意义十分重大,对此,邹世鹏说:“物化,这一为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所揭示,为卢卡奇所特别阐发,也引起存在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及其他一些当代思想家高度重视的问题,已累积成现时代精神生活的总体问题”^[12]。不过,学界对“物化”概念的使用抱有谨慎态度,认为“物化”一词,容易被简单化为纯粹之物(Ding)的物质化、外化、对象化等,失去其批判性,容易被曲解为抽象实体,失去其主体际性。为了避免误解“物化”,一些学者在用词上进行了斟酌,如日本学者广松涉、平子有长等用“物象化”来表示“物的社会关系”,凸显此“物”非纯粹之物“Ding”,是社会化之物(Sache)。国内学者韩立新、刘森林等借鉴并接受这一用词,认为“‘物化’表示了一种客观事实,而物象化则进一步表示批判意识已经看透这种事实了。”^[13]学界在类似意义上的用语还有“事物化”、“事态化”等等,而本文还是采取通常所用的概念——“物化”,以示交往的异化形式——物(Sache)的社会关系。

考察发现,马克思关于交往异化“物化”形式的论述,最初出现在“巴黎手稿”尤其是作为手稿之一的《穆勒评注》中。在《穆勒评注》中,马克思通过对国民经济学货币理论、信贷理论的批判,披露了交往异化的“物化”形式。

谈到货币,马克思直截了当地说:“货币的本质,首先不在于财产通过它转让,而在于人的产品赖以互相补充的中介活动或中介运动,人的、社会的行动异化了并成为在人之外的物质东西的属性,成为货币的属性”^[14](P164-165)。就是说,货币虽还具有“物”的外观,但在其本质上是具有“社会性”的交换的中

介。对此,韩立新评价说:“这一中介的出现在人类史上绝对是一件大事,它不但使‘人本身不再是人的中介’,而且使人格与人格之间的交往蜕变成私人所有和私人所有之间的交换,并反过来开始支配人格与人格的交往本身。”^[10]正因为如此,货币“成为真正的上帝”^[11](P165)。如此一来,从事交换活动的人不是作为人,而是作为以货币为中介的私有者来相互对待,由于“两个私有者发生相互关系的……就是他们的私有财产的物质”^[12](P172),那么,“两个私有者的社会联系或社会关系表现为私有财产的相互外化”^[13](P173)。交往也就表现为私有财产与私有财产之间的社会关系,即“物与物之间的关系”。

在谈到信用业时,马克思说:“似乎异己的物质力量的权力被打破了,自我异化的关系被扬弃了,人又重新处在人与人的关系之中。”^[14](P167)而实际上这不过是一种假象,“在人对人的信任的假象下面隐藏着极端的不信任和完全的异化”^[15](P168)。为什么会如此呢?因为在信贷中,人本身代替了金属或纸币,成了交换的中介,成了“物”,“不是货币被人取消,而是人本身变成货币”^[16](P169)这看似“交换的媒介物”的确从它的物质形式返回和回复到人,不过这只是因为人把自己移到自身之外并成了某种外在的物质形式”^[17](P169)。

马克思的物化思想又经典地展开在其后期论著《资本论》的“拜物教”批判中。“‘拜物教’和‘物化’的范畴是彼此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它们唯一的、相同的社会关系的两个不同的提法,这种社会关系以物与物的关系掩盖着人与人彼此之间的关系。”^[18]所谓“拜物教”,“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19](P89)。

“商品”是“拜物教”的初级形式。资本主义是一个“庞大的商品堆积”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们从事生产的目的是为了享有,而不是为了交换。这样,交换使劳动产品之间、从而使生产者之间发生了关系,不过,在交换的过程中,交换者双方所关心的只是产品价值的实现与增值。因此,一旦劳动产品采取了商品形式,它就把“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20](P88)。

“货币”是“拜物教”的发展形式。货币是一般等价物,是资本主义颠倒世界的“上帝”。货币的这种功能和地位,势必使货币成为人们欲望的终极目标,使

得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直接通约为物的关系——货币关系。所以,“物的货币形式是物本身以外的东西,它只是隐藏在物后面的人的关系的表现形式”^[21](P109)。当然,这种形式仍然是“物化”形式,并且变得更为精致、更为耀眼。

“资本”是“拜物教”的完成形式。资本来到世间,“这种着了魔的颠倒的世界就会更厉害得多地发展起来”^[22]。资本“颠倒”世界的“厉害”之处,在于它把资本主义世界中的“物化”关系纳入自身的“增殖逻辑”。为了揭示这一点,马克思特别分析了作为资本神秘化的极端形式——生息资本,指出“在生息资本上,这个自动的物神,自行增殖的价值,创造货币的货币,达到了完善的程度,并且在这个形式上再也看不到它的起源的任何痕迹了。社会关系最终成为物(货币、商品)同它自身的关系”^[23],因而,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达到了最高点的物化,取得了最彻底的物的形式。

总之,在现代私有者社会中,出现一种商品货币关系普遍地掩盖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社会现实。对此,马克思控诉道:“这个异化的社会是一幅描绘了他的现实的社会联系,描绘他的真正的类生活的讽刺画。”^[24](P171)

三、交往异化的实质:社会对抗

假如说“物化”是交往异化思想的形式表征,“社会对抗”就是其实质内容。假如说“物化”是现代私有制条件下“人与人的真实关系”的表现,那么,“社会对抗”就是现代私有制条件下“人与人的真实关系”本身。马克思的触觉之所以能深入到这一点,与其彻底的批判精神及价值取向密切相关,他认为“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25],并在批判旧世界中实现合乎“人的关系”的新世界。

国民经济学家很难达到这一“实质”,因为“国民经济学家以交换和贸易的形式来探讨人们之间的社会联系或他们积极实现着的人的本质,探讨他们在类生活中、在真正的人的生活中的相互补充”^[26](P171),视“社会是一个商业社会。它的每一个成员都是商人”^[27](P171),他们看到的是作为商品的物及物的关系。再加上国民经济学家的阶级局限性,使他们不愿意去关注“物化”背后的人的社会关系,当然,也不会知道人的这种社会关系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类交往关系,而是特定历史阶段——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对抗性社会关系。不仅如此,为了美化

资产阶级社会,“国民经济学把社会交往的异化形式作为本质的和最初的、作为同人的使命相适应的形式确定下来”^{[1](P172)}。国民经济学对人与人之间物的关系的纯粹经济学定位,所导致的后果是对现代私有制条件下“人与人之间真实关系=对抗关系”的彻底遮蔽。马克思所做的就是要把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无视的“现实”剥离出来,进而把它大白于天下。

为了批判国民经济学家,马克思指出“假定一个人是私有者……私有财产是他个人的、有其特点的、从而也是他的本质的存在”^{[1](P172)},那么,私有者之间为什么要交换呢?根据国民经济学的说法是由于需要,“这种物是我需要的,我没有它就不行或者我不愿意没有它,在我看来,它是补足我的存在和实现我的本质所必需的”^{[1](P172)}。这样,就好像发生了国民经济学所认为的:私有者之间存在一种因为个人匮乏和彼此需要而相互补充的物的交换关系,而且,交换是在自由、自愿、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的,因而也是自然、公正的,如李嘉图认为劳动者的生活费是他的劳动的自然价格,无产者为了活下去而去劳动乃是一种非常正常的情况。果真如此吗?马克思立足生产劳动对此做了否定的回答:“我同你的社会关系,我为你的需要而进行的劳动不过是假象,我们的相互补充,也只是一种以相互掠夺为基础的假象。”^{[1](P181)}就是说,国民经济学依照“经济规律”所精心“编制”的人与人之间基于物的需要而相互交换的社会经济关系,只不过是表象上的规定,事实上暗藏着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以“相互掠夺”为基础的人与人之间的对抗关系,而国民经济经济学眼中的“物”(商品、货币、资本),恰是人进行对抗中的“公认的权力”^{[1](P182)}。何谓“权力”呢?王德峰一言中的:“权力之为权力,总是指称这样一种人与人的关系,即人对人的支配欲被支配、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15]

大体上说,现代私有制社会中的社会对抗体现在两个维度:一个是横向的人与人之间的普遍对抗,另一个是纵向的资产者(资本家)与无产者(工人)之间的阶级对抗。

马克思认为,现代私有制社会是一个处于普遍对抗的社会,其中,每个人视他人为自己潜在的竞争对手、自己利益实现的妨碍者,“这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所造成的结果,不是普遍的肯定,而是普遍的否定”^{[16](P102)}。这决定了现代性的生产不是本真“社会的生产”,交换也不是本真“互相补充的交换”,“我们每个人都把自己的产品只看作是自己的、对象化的私利,从而把另一个人的产品只看作是别

人的、不以他为转移的、异己的、对象化的私利”^{[14](P181)},由于我的产品是我的“私利”,那么你对我的产品的需要并不能使你获得支配我的产品的权力,“相反,你的需要、你的愿望、你的意志是使你依赖于我的纽带,因为它使你依赖于我的产品”^{[14](P181)}。其后果是,你的需要“根本不是一种你支配我的产品的权力的手段,倒是一种我支配你的权力的手段”^{[14](P181)},反之亦然。这种权力格局下,人的依赖纽带、血统差别、教育差别等等统统都被打破了,人们成了独立的“经济人”,“确切些说,可叫做在彼此关系冷漠的意义上——彼此漠不关心”^{[16](P110)}的人。

就纵向而言,社会对抗集中体现为社会两大对立阶级——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间的对抗,以资本家剥削、压迫工人,工人反抗资本家为典型特征。

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依托“劳资冲突”,揭露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对抗关系。在资产阶级社会,工人或劳动成了商品,资本则是积蓄的劳动;工人能否找到买主取决于需求,而需求取决于资本家的兴致,资本则因为其不可抗拒的购买力,具有支配他人劳动的权力;工人的工资取决于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敌对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吃亏的首先是工人,而资本家为了“利润”的最大化,总是把工人的工资限制在与“牲畜般的存在状态相适应的最低工资”^{[14](P7)}。不难看出,劳动俨然从属于资本。资本对劳动的支配地位,决定了资本家对工人的统治、支配、压迫,当工人感觉到他所从事的劳动不过是“替他人服务的、受他人支配的、处于他人的强迫和压制下的活动”^{[14](P60)}时,就会反过来反抗资本家的压迫。

按照马克思的理解,伴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演进,阶级对抗也会不断加重。如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一文中指出,资本文明的进步必然会强化资本对劳动的支配权力,导致“一方面工人的收入在资本迅速增加的情况下也有所增加,可是另一方面横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社会鸿沟也同时扩大”^{[15](P355)}。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通过分析资本增值的源泉——对剩余劳动的无偿占有,指认了资本对劳动的强制关系:资本发展成为一种强制关系,迫使工人阶级超出自身生活需要的狭隘范围而从事更多的劳动。作为他人辛勤劳动的制造者,作为剩余劳动的榨取者和劳动力的剥削者,资本在精力、贪婪和效率方面,远远超过了以往一切以直接强制劳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毋庸置疑,对工人所采取的这种“强制关系”下的剥削,也就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15]

(P275)。“但是工人作为这个过程的牺牲品却从一开始就处于反抗的关系中,并且感到它是奴役过程”^[7],就会激烈地反抗资本家的压迫,“随着同时雇用的工人人数的增加,他们的反抗也加剧了,因此资本为压制这种反抗所施加的压力也必然增加”^[8](P368),从而使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阶级对抗置于尖锐而又不可调和之中。不过,到了这个时候,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敲响了”,一个合乎人的关系的社会也就会随之而来。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478.
-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40.
- [7] 栗本慎一郎.经济人类学[M].王名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23.
- [8] 邹世鹏.现时代精神生活的物化处境及其批判[J].中国社会科学,2007,(5).
- [9] 刘森林.物与无:物化逻辑与虚无主义[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253.
- [10] 韩立新.《穆勒评注》中的交往异化:马克思的转折点[J].现代哲学,2007,(5).
- [11] 陆梅林.程代熙编选.异化问题(上)[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6.513.
-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3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934.
-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503.
-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416.
- [15] 王德峰.社会权力的性质与起源——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分析[J].哲学研究,2008,(7).
-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49.

[责任编辑:来小乔]

Social Antagonism: Essence of Marx's Communication Alienation Theory

LIU Wen-yi

(College of Marxism,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32)

Abstract: Communication is the basic way of human existence. In modern capitalist private ownership, it appears in the form of universal “alienation”. Communication alienation indicates people do not treat each other as humans but as materials. In the situation of communication alienation,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turns in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terials” or “materialized relationship”. Hidden under the “materialized” communication alienation is “the real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namely social antagonism. Social antagonism mainly manifests in two dimensions: the horizontal universal antagonism between humans and the vertical class antagonism between bourgeois and proletarians.

Key words: communication alienation; materialization; social antagonism